

（一）论杜诗中的“狂顾”、 “狂走”和“狂歌”

本篇摘要：探讨杜甫的“三狂”——即“狂顾”、“狂走”和“狂歌”——精神。“三狂”都是杜诗中的自况。如“狂顾”含有在浪游中瞻念故国的意思。诗人的“狂走”体现了漫游生涯，“狂顾”体现了人文关怀，因而能以饱满的创作激情，“狂歌”不已。所以，总的说，它们概括了老杜的生活道路，也表现了少陵的创作品格和人生理念。同时，本篇在“狂放”方面，将杜甫与李白、阮籍进行了扼要的对比：杜的“狂而简”是“入世”的，是自苦；李的“狂而肆”是“济世”的，是自重；阮的“狂而谲”是“避世”的，是自怜。



杜甫具有“三狂”精神——即“狂顾”、“狂走”和“狂歌”。这种精神使杜诗从诗人的心路历程出发，向华夏的榛莽大地走去，最终达到了古典诗歌的颠峰。

“三狂”都是杜诗中的自况。少陵笔下的“狂顾”含有在浪游中瞻望故国河山和系念国家命运的意思，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体现了杜甫的诗格，因为这是他作为伟大诗人的不断吸取艺术营养激发创作热情的需要。“悲辛但狂顾”是在《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中说郑虔的：“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顾”，也是杜甫的自况。“狂顾”的出典，见于屈赋的《抽思》：“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王逸释“狂”为“遽”。杜甫的“狂顾”已经超越了这种用法。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又读庄老，重增其放，顾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由禽鹿，少见驯育，则服

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飧以佳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这里“狂顾顿缨”指挣脱藩篱；似乎“悲辛但狂顾”也含“狂顾顿缨”的意味。

杜甫使用“狂走”，如《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狂走终奚适”；吟诵了他的浪游生涯的不可避免的结局。而“狂催走”一语，更准确传神地描述了诗人的浪游是主客观条件下的产物：“丧乱闻吾弟，饥寒傍济州。人稀书不到，兵在见何由。忆昨狂催走，无时病去忧。即今千种恨，惟共水东流。”（《忆弟二首，时归在南陆浑庄》之一）另外，“穷迫挫曩怀，常如中风走”（《上水遣怀》）的“中风走”，也是“狂走”的意思（因为“狂走”原出于朱浮的《与彭宠书》：“中风狂走，自捐盛时”），同样道出了壮志受挫而浪游的心态。

杜诗中的“狂歌”则见于“狂歌托圣朝”（《官定后戏赠》）、“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望牛头寺》）等。

《抽思》中的“狂”，经杜甫如此化而用之，后人则继续使用老杜的用法。如元好问诗：“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再如陈寅恪诗“十载长安走若狂”。特别是陈寅恪氏的这句诗，隐括老杜的“狂走”，诗意和句法均颇为老到。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杜甫的“三狂”的内在联系——在客观上，由于诗人遭遇乱离的世道，他不得不走上一条漫长的浪游之路；在主观上，他也选择了这样的“狂走终奚适”的不归之路。而“昔人戒垂堂，今则奚奔命？”（《早发》）这里的“奔命”，也可以作“狂走”的注脚。总之诗人的“狂走”体现了漫游生涯，“狂顾”体现了人文关怀，因而能以饱满的创作激情，“狂歌”不已：毕生不倦地进行在诗歌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诗歌创作。“三狂”不只是个人性格问题，而是体现了杜甫的爱国、热爱大好河山、接近人民，并喜爱在漫游中进行诗歌创作的境界。同时，“三狂”精神的出现，是有其历史框架和背景的。在民族的斗争和融合中，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士庶人民向南方“崩奔”的

现象。在杜甫的时代，如杜甫所描写的“边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李白所吟咏的“四海南奔似永嘉”（《永王东巡歌》之二），可以说“狂走”就是具体的、特殊的“崩奔”。所以，杜甫最后的漂游南方，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如《江南逢李龟年》吟诵大历五年（770）在潭州（长沙）与李龟年邂逅，《长沙送李十一》记叙在潭州送别重逢的旧友李衔，都说明在杜甫“狂走”的路途中，不乏同路人。

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中，诗人高歌：“漫卷诗书喜欲狂”。从这样的充满激情的诗句中，人们颇能看出少陵的好诗酿造的条件：在“狂走”与“狂顾”中，不断催生着“狂歌托圣朝”。从另外的角度看，杜甫自称“杜陵野老”（《投简咸华两县诸子》）、“杜陵野客”（《醉时歌》）、“野叟”，即一生为官的时间极少，基本是一介布衣。这与他的“三狂”品格，也是平行的。总的说，“三狂”是诗人一种特殊的无怨无悔的，脚步、舟楫不能停歇的浪游情结、创作品格和人生道路。

杜甫的一生最突出、重大的抉择是：不恋棧于“唐代小臣”（这是古人怀着同情对杜甫的如实描写）的地位；不深陷于卑微而温饱的幕僚生活；不滞留于亲手惨淡经营起来的草堂——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毕生漫游之路。

杜甫一生浪迹天下。在前期曾壮游吴越赵晋齐鲁梁宋，这也是当时相当多的文人的时尚。在后期，他本应结庐在相对固定的地方；但时局和生计又不允许他这样做，所以不能不流离陇蜀。然而，当严武最后一次镇蜀后不久，为什么杜甫还是辞掉幕府职务、义无反顾地踏上浪游荆湘的不归之路呢（虽然他曾在成都草堂逗留、犹豫过）？诗人不可能预见他的靠山严武会壮年暴死（严武之死当然使他最终无可留恋）。他和严武可能的交恶，也只是后人的揣测之词。所以，浪游性格的驱使，应该是后期杜甫变本加厉甚至狂热地漂游的主要动机之一。沿途的动乱，更促使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之，终其一生，他是在漫游（从壮游到流离到

漂泊)中度过的。历来认为杜甫这是为了辗转回返东京洛阳一带(《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原注:“余田园在东京”)但这似乎也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原因。缺少旅资,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杜甫难以回返家乡;如《赠韦七赞善》一诗记叙送别北归长安的韦七赞善,说明贵胄子弟北归的路途仍是畅通的,而杜甫只有望乡兴叹,继续漂泊。

“如何关塞阻”诚然是使少陵限于困境的实情,“转作潇湘游”(《去蜀》)却是诗人另一种郑重的选择。甚至“老夫乘兴欲东游”(《解闷十二首》);“虽伤旅寓远,庶遂平生游”;“我生本飘飘,今复在何许?……浩荡前后间,佳期付荆楚”(《宿青溪驿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更觅衡阳董炼师,南浮早鼓潇湘舵”(《忆昔行》);“蛟龙无定窟,黄鹄摩苍天”(《寄题江外草堂》),等等,成为他浪迹荆湘的理由和信念。湖南的亲友挽留过他,诗人仍然我行我素,继续“狂走”、“崩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如果换了别人(平庸一些的人),在那样的充满战乱的时代,也可以安于“小臣”的位置,或满足于幕府生活[这种生活是卑微而温饱的,虽然是遭白眼:“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久客》)、“肉食晒菜色,少壮欺老翁。况乃主客间,古今逼侧同”(《赠苏四溪》)]但有安稳,有酒喝,而不必如杜甫这样,足茧荒山,一叶扁舟,漂泊浪游,客死蒿莱。我们要问: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从根本上来讲,杜甫是不能忍受朝廷(如代宗)的行事,不愿苟活于庸碌的幕府生涯,特别是,要完成他所甘愿承担的诗歌创作的艰难的历史使命,才选择了“狂顾”——即在浪游中进行诗歌创作的道路的。少陵倾其毕生的精力,凭借其史笔诗才(如元稹所讴歌的“杜甫天才颇绝伦”),和诗歌世家的百年资质积累(所谓“诗是吾家事”)勇敢地面对并完满地回答了在诗歌发展史上必然遇到的几大课题的挑战。这种时代和历史的挑战主要表现为:诗歌要不要表现,中华民族必然遇到的大规模的民族斗争、融合的内涵,形成“诗史”;诗歌能不能反映广阔的社

会生活，“以时事入诗”；古色古香的古体诗，要不要发展为节律精密的律诗——特别是长篇排律。而要真正完成这一使命，杜甫必须具有“三狂”精神和品格。

二

对杜诗的成功经验，古往今来有无数的评述。评述是从各个方面立论的，有的是理性的，有的甚至带有神秘色彩，但都常常接触到杜甫的客观上实际存在的“浪游”生涯，以及杜甫的主观意志、创作激情。如王士禛说：杜陵“……登吹台于梁宋，则支离东北风尘；栖江阁于夔州，则漂泊西南天地。故浑脱浏漓，只如其自道，顿挫独出，能此者几人？”^{〔1〕}——“漂泊”等等是客观存在的浪游；“浑脱浏漓”、“顿挫独出”是主观方面的创作激情。

周必大《文忠集》卷十七《跋鲁直蜀中诗词》：

“杜少陵、刘梦得诗，自夔州后，顿吴前作，皆言文人流落不偶，乃刻意著述，而不知巫峡峻峰激流之势，有以助之也山谷自戎徙黔，身行夔路，故词章翰墨日益超妙观此三帖，盖可知也”^{〔2〕}

这话虽然说得“悬乎”了点，其实还是接触到了“浪游”对创作有所助益的问题

宋·张方平：《读杜诗》：“流寓四方路，浩荡平生心。”也概括了杜甫在浪游四方中吟咏国事的诗格。也可以说，对杜诗的成功，概括为两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流寓四方路”和“浩荡平生心”；前者是“狂走”般的生活体验，后者是“浑脱浏漓”的创作激情。

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

……”（张安道即张方平。）这里，“天意遣奔逃”与“流寓四方路”，诗意是平行的。“奔逃”竟是“天意”，说明杜陵的诗歌成就（“扫地收千轨”是集大成，“争标看两艘”是李杜齐名），是有赖于“奔逃”即“流寓四方路”的。

高适（接续杜诗的诗意）称杜甫为“东西南北人”：“龙锺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人日寄杜二拾遗》）也是说杜甫以四海为家、居无定所。宋人何梦桂在《永嘉林霁山诗序》中也说：杜诗的“长篇短章，横鹜逸出者，多在流离奔走失意中得之。”

不必是“身行夔路，故词章翰墨日益超妙”，而是因有“浩荡平生心”，加上“流寓四方路”乃至“奔走”、“奔逃”和“身行夔路”，自然诗词超妙。杜甫一生正是以“野叟”、“野老”、“野客”的姿态，悯时伤乱，奔走呼号，“狂歌”不已。

古代文士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就是漫游或浪游如谢灵运、李白、顾炎武等都以游历山川而知名原因则是多方面的：纵情山水、关注民情、游学会友、寻诗摘句、求仙访道、考察山川形势，及流亡等等，不一而足。但一般发生在人生的一段时间之内。像杜甫这样，毕生浪游，颠沛流离，还是较为鲜见的。这样的浪游情结也许是较难理解的，但我们不应用对待一般人的眼光来审视杜甫。作为一个可以代表唐代诗歌乃至全部古典诗歌颠峰成就的诗人的杜甫，这种品格和情结，无疑是具有非凡的意义的。这样的如“夸父逐日”般的浪游的品格，说明了诗人对真善美和艺术的不倦追求，对故国山河的深挚眷恋。何况，这也是巨变的历史和乱离的世道给予杜甫的。正如古人针对杜诗《发秦州》、《发同谷》所说：“万里之行役，山川之夷险，岁月之暄凉，交游之违合，靡不由尽，真诗史也。”（《杜诗镜铨》卷七引李因笃语）——“三狂”精神、浪游情结对于杜诗的“诗史”成就，是有其不可低估的作用的。

我们不应从消极的方面，理解杜甫为何进行诗歌创作，如有

的著作中所诠释的那样：“杜甫的晚年生活，真是穷愁潦倒。这一时期的诗，都是哀音满纸，使读者悱恻无欢。但是他从广德元年（公元 763 年）夏季，离成都东游，在渝州（重庆）、忠州（忠县）、夔州住了一个时期，又南下到沅、湘而最后死在耒阳，这六七年写的诗却最多。大概无聊之极，止有天天吟诗，才能稍稍发泄他的忧郁悲愤的情绪。”——这种对于杜诗创作的较消极的读解，不能不认为是对“诗是吾家事”的杜陵诗歌世家和杜甫的诗歌历史使命感的忽视，也是对唐代士人与诗歌的魂牵梦绕的紧密关系的漠视吧

三

“狂”屡见于杜诗，他的“狂”也是有其发展历程的，从早年的“裘马颇清狂”（《壮游》中的回忆），“更调鞍马狂欢赏”（《乐游园歌》）到“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等等。

诗人描写自己的日常动作，有时也状以“狂”字，如：“醉把青荷叶，狂遗白接篱”（《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八）。按：“白接篱”为古时一种头巾。《钱注杜诗》：“白接篱：尔雅注：白鹭翅上有长翰毛，江东取为接篱。”^[3]——《新唐书·杜甫传》：记叙严武待杜甫甚厚，亲至草堂，老杜“或时不巾”。这也就是“狂遗白接篱”吧

杜甫是否真的“狂放”？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他似乎是处处小心翼翼的，自己也声言“奉儒守官”。因此，似乎不好肯定老杜的这种“狂放”其实，杜甫确有内敛外狂的另外一面。杜甫的一生，如前文所述，有两大问题（或说是两大行径），历来得不到很好的解释。一、弃官和不奉诏；二、离开蜀地，并未北上辗转返回洛阳故乡（虽然是因战乱的阻隔），而是孤舟东下，浪游荆湘（虽然少陵吟诵着“东游西还”，实际是离故乡越来越远）。——如果从杜甫的“三狂”精神来加以适当索解，也许能

回答以上的两大问题。

当然，同为“狂”，杜甫与阮籍、李白是有所不同的。阮籍是在大将军司马昭身旁，佯作狂放以避祸。李白是表里如一的狂放。杜甫则是在总的“奉儒守官”的（虽然最后“守官”而守不下去）原则之下，具有一定条件下的“狂而简”的品格。

如果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杜甫“狂”的可贵。阮籍的狂放与杜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阮籍的“狂”的表现是：嗜酒如命，不尊礼法。他以大隐于朝的姿态，既受司马昭的保护伞的荫蔽，又和司马氏若即若离。既接受曹魏重臣蒋济的召辟去作掾属，又虚与委蛇，旋即告辞回家。既作过司马氏的贴身僚属——从事中郎，又去作曹魏皇室的散骑常侍。后来虽然不作司马昭的僚属，却经常出入司马昭的大将军府参加饮宴，又装醉拒绝与司马氏联姻。这样佯作“狂”态，玩弄平衡。当然，阮籍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李白的狂放则是另一种表现。这里可以坦然表白了李白的政治理想的《永王东巡歌》（之二）为例，来考察李白的狂放：“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面对安史之乱，二帝（玄宗、肃宗）蒙尘，四海鼎沸，李白向永王请命和表态，愿作指挥若定、谈笑间使胡虏灰飞烟灭的统帅人物；气势超迈，豪情满怀。虽然说了点说大话，然而，李白的大话却能赢得不朽的诗名。原因在于：首先，李白的狂放是人所公认的，正如杜甫所描写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人们不在乎他说的是大话，而欣赏他的豪情。其次，李白的诗才是无与伦比的，“为君谈笑静胡沙”这种艺术上的横空出世的魅力，能淡化和掩盖他的傲岸和桀骜不驯。

如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之《杜诗凡例》二十则之十八所说：“太白狂而肆，少陵狂而简。其在成都，结庐枕江，与田夫野老相狎荡，便有傲睨一切、侮玩不恭之意。初寓云安，得钱沽酒，时招郑虔；后去夔州，举四十亩果园赠与知交，毫无顾恋。

此与谪仙之千金散尽者，同一磊落襟怀。宜其诗品迥出寻常。”他举的事例也许并不全面，但是对于李杜“狂而肆”、“狂而简”的概括是较为准确的。这里的“肆”指汪洋恣肆；“简”即简易，含性情简易和善的意味（也有一定的“简傲”的意思）。也就是说，杜甫的“狂”是内向的、内敛的、孤傲的，而不是向外发泄的，是倾向于自我委屈甚至自我“放逐”的（如“狂走”）。——而对于阮籍，不妨以“狂而谲”来加以概括。

也可以说，杜甫的“狂而简”是“人世”的，他的“狂”是委屈自己；李白的“狂而肆”是“济世”的，他的“狂”是发泄自己；阮籍的“狂而谲”是“避世”的，他的“狂”是保护自己。——因为杜甫的“三狂”精神总的说就是强烈的“人世”精神，甘愿抛弃“小臣”的俸禄和幕僚的温饱，受苦受罪去“狂走”，以求得自身不与昏庸的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道德上的满足，和诗歌的高质量的丰收。李白则不但要入世，其“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境界尤其表现了“济世”情怀，自然要发泄对世事的不公。而阮籍的“避世”无疑是为了在乱世中和暴君面前苟全性命。——所以，李白是性情的狂；阮籍是佯装的狂；而杜甫是进取的狂（《论语·子路》：“狂者进取”）。透过这样的简单比较，也许能更深一些地读解和进入杜甫的“三狂”境界。

四

三狂精神与正确的处世的态度（包括创作态度）是一致的。《杜诗摺》释《风疾舟中伏枕》诗说：“……‘畏人千里井，问俗九州箴’，首句言到处兢兢，次句言浪游非止一方也。”^[4]——不但表明浪游确是诗人的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且也说明杜甫对各地人民和风俗是充分尊重的，甚至是爱护倍加、小心翼翼的。

三狂精神与抛弃官场的尊荣的理念也是平行的：如“更议居远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颍客，荣贵如粪土。”（《贻阮隐居

昉》)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立秋后题》)此邦俯要冲,实恐人事稠。应接非本性,登临未销忧。(《发秦州》)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遗意二首》之一)——这些诗句中的“荣贵如粪土”、“应接非本性”等,对于诗人是真实的内心表露。

因为,这种思想与浪游品格是互动的。如“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独往”见于《庄子·在宥》:“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可见杜甫的浪游和弃官漫游独往独来的素志是互动的。“三狂”说明杜甫以漫游为乐,同时也是乱离情势下面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当然,后来杜甫也饱尝浪游的辛酸和痛苦;但是他并没有后悔。

杜诗中又多次吟咏自己的“谋拙”或“计拙”:“楚岸行将老,巫山坐复春。病多犹是客,谋拙竟何人。”(《太岁日》)“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卷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发秦州》诗中也说:“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这些,与其说是自惭于,不如说是自诩于“谋拙”因为老杜的“谋拙”是乱离的世道下面,一些士子的必然命运和遭遇“计拙无衣食”,也是对陶渊明“生生所资,颇乏其术”的、应有之义的呼应。如果人们同情渊明的清高,也应该理解杜陵的困窘。

“三狂”与诗人的“谋拙”,也是一致的。从深一些的层面来说,为什么“谋拙”?是因为甘于因“谋拙”而清贫,以换取诗歌的丰收。杜甫也不讳言:“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也可以说,杜甫的“计拙”、“谋拙”、自奉维俭,与“举四十亩果园赠与知交,毫无顾恋”(据说,受赠的“南卿”就是《简吴郎司法》、《又呈吴郎》诗中的吴郎)那样的慷慨大方,看似矛盾,实际上都是“三狂”精神的各种外在表现。

结语：

杜甫的“三狂”，正是一种严肃的创作态度和人生理念。也可以说，“三狂”精神对于铸造杜诗的博大精深、沉郁顿挫，是不可缺少的条件。“狂顾”的历程，不但激发了诗人的创作激情，而且提供了鲜活的、源源不绝的、来自故国和黎民百姓的创作素材。杜诗的“善陈时事”，端在于此。所以，举凡烽火与家书、青琐与昭阳、蜀麻与吴盐、国马与官鸡、胡童与楚女、丽人与健妇、老翁与老妪、黄鹄与白鸥、租庸与征求、米贱伤农与鬻儿卖女……，林林总总，都进入诗人的视野和笔端。——这就是杜甫！否则何以言“集大成”？关键就在于，杜诗在这里以雄鸷奥博（这是主要的）、敦厚温柔（这也是不少的）、飘逸轻盈、亲切家常、雅俗并具的多样性风格，将这些丰富多彩的典型形象，描绘出唐代社会生活的多维画面，揭示了一个充满壮阔、悲情和苦难的时代的真实。而且，在“狂顾”的过程中，杜甫的“狂走”生活越是艰苦，创作就越是丰厚。如在入蜀前后的充满丧乱之痛和饥饿之苦的路途中，在出蜀的“老病孤舟”的漂流里，正是老杜诗情最为澎湃的创作旺盛期。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对杜甫十分心仪，对杜诗读熟吃透了的文天祥说：“杜太苦，李太放”（《跋王道州仙麓诗卷》）。陆时雍也说：杜甫“苦意摹情”、“苦于摹情，工于体物”。^[5]是的，杜甫的“狂”是“入世”的，他的“狂”是委屈自己，是自责的、自苦的；李白的“狂”是“济世”的，他的“狂”是放浪自己，是自重的、自矜的；阮籍的“狂”是“避世”的，他的“狂”是保护自己，是自怜、自恋的。也许，面对杜甫的“自苦”，人们会问一句：“何必自苦乃尔？”——如果看到“三狂”品格对于杜甫在文化史上和杜诗在诗史中的崇高地位的决定性作用，人们就可以理解和解读杜甫的一片苦心孤诣了。

杜甫的苦心没有白费，他确实给诗坛带来了划时代的诸多元素：因洞察历史的真谛而创造了“诗史”；因反映人之欲求而抒

发了人性的真实；因题材的广阔而完成了社会的全景式的画面；因殚精竭虑于诗律（也是为了表现以上各方面的内涵）而上攀了诗体的发展颠峰。

附注：

[1] 王士禛等：《师友诗传录》，《清诗话》上册，14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2] 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二十六，《宋诗话全编》六，5931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3] 杜甫著、钱谦益笺注：《杜诗笺注》卷十五，301 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

[4] 唐元竑：《杜诗掇》四卷，《四库全书》卷一百四十九，集部二别集类二，文渊阁本（1070 册），8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陆时雍：《诗镜总论》，《历代诗话续编》下，1413、1414 页，中华书局，1983。

（原载《杜甫研究学刊》2003 年 2 期）

（二）论杜诗“以我为诗”

本篇摘要：考察“以我为诗”与杜诗自传体风格“若即若离”的关系；并讨论“以我为诗”与杜甫的“推理之明，料事之确”（陈寅恪语）的内在联系；最后分析了杜诗从“以我为诗”何以能达到独特的“无我之境”。

关于杜甫诗歌的特色何在，是千百年来“杜诗学”所关注的一个重点。其中有一种引人注意的看法，就是认为杜诗“以我为诗”。如《杜臆》作者《杜诗笺选》的旧序所说，杜甫是“以我为诗，自成一家”^[1]。这确乎道出了杜诗的独特之处。杜诗无疑是拥有“性情”的，但决非吟咏性情，以性情为诗；杜诗也无疑是富有“才学”的，但决非炫耀才学，以才学为诗。可以说，终其一生，杜甫只是以一个凡俗的“少陵野老”和“杜陵布衣”的“我”为诗，却构筑了其不朽的诗家的地位。关键在于：杜诗忠实于现实和历史，所以决定了老杜的“以我为诗”，天然地是以历史的真实为诗。

一、“以我为诗”与自传体风格

（一）关于“出于自道”和“如其自道”：

“以我为诗”，从肤浅的层面说，就是写自己。《杜臆》的《杜诗笺选·旧序》还说：“公之为诗，多出所自道”^[2]。王士禛也说，杜陵“……登吹台于梁宋，则支离东北风尘；栖江阁于夔州，则漂泊西南天地。故浑脱浏漓，只如其自道，顿挫独出，能此者几人？”^[3]当代的评论者也强调说：“杜诗忠实地记录了他饱经丧乱、忧国忧民的一生，可作少陵年谱看。”^[4]（实际上“少

陵年谱”的看法也是本于古人。）

那么，强调“以我为诗”、“出于自道”、“如其自道”、“可作少陵年谱看”，如果这个“我”或“自”并无惊天地的功业，又无泣鬼神的遭遇，如何能造就其诗坛的地位呢？——而杜甫如古人所说是“唐代小臣”，功业一般，在“禄山之难”的乱离岁月之中，少陵虽饱经丧乱之苦，这毕竟是他同代不少士子的共同命运。如果单凭“少陵年谱”，又如何能打造他的“诗史”、“诗圣”的艺术殿堂呢？可见，杜诗的“以我为诗”应该是有其特殊的内涵的。另外，只是强调“以我为诗”，会遇到好多大诗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有“写自己”的倾向这种问题，又如何能诠释杜诗的特殊内涵呢？

其实，所谓“以我为诗”说明，全部杜诗是带有某种自传体的风格的。但杜诗与“自传”又是“若即”而“若离”的。如《杜臆》《旧序》所说：“境逢险阻，情触缤纷，经纬相纠，榛楚结塞，他人攉指告却，少陵盘礴解衣。”——即杜甫能义无反顾地、坦然地奋笔耕耘在自己的心历路程和榛莽大地之中。不要小看了这种特殊的耕耘；这需要有坦然地、赤裸裸地袒露自己、解剖自己的内心和灵魂的勇气。关键在于，老杜“以我为诗”，句句坦言自己，但又不忘故国宫阙和黎民百姓。从早年的自白：“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进雕赋表》，这个《表》是用赋体写的，带有广义的诗体的性质）、“有儒愁饿死”（《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其目的是不惜卑词向皇帝和高官高标自己“沉郁顿挫”的诗才，以求兼善天下苍生。到壮岁悲吟从被安禄山占领的长安逃出：“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北征》），不辞万死回到朝廷效力。到中年的流离陇蜀，甘于承认自己的“谋拙、计拙”（缺少谋生之计）：“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客夜》），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并吐露肺腑：“虽为尚书郎，不及山野人”（《寄薛三郎中据》），而坚持自己报身许国的壮志：“大哉乾坤内，吾道长

悠悠（《发秦州》）直到暮年的浪迹荆湘的“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并以“东游西还”（《严氏溪放歌》）概括自己最后的飘泊，而直至生命的终结仍秉持着对“故国”的“愁思”终身不废吟诵故国和人民命运的诗歌创作：“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处处粘着于“自传”而又限制于“自传”。

是的，“以我为诗”的老杜，也曾坦言自己的功名欲求。所以，唐代的司空图讥讽说：“亦知王大是昌龄，杜二其如韵律清。还有寒酸堪笑处，拟夸朱绂更峥嵘。”（《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之十五）宋人周必大也说：“杜工部诗屡及银章……”。陆游则说杜诗中“时时矜省郎”（《秋兴》）（“朱绂、银章、省郎”指官服、官印和官位。）——其实，作为凡人的士大夫情结，和作为诗歌的爱国主义的美学品格，对于杜陵是同时存在的，也是和谐的，互动的，不必大惊小怪。

王安石评杜诗说：“无施不可”。沈德潜则说：“杜诗别于诸家，在包络一切”^[5]。这个“无施不可”和“包络一切”也正是杜诗的一定的自传、自绘的特点所决定的。杜诗的“以时事入诗”的“时事”虽然以国事为主，但其它从烽火到家书、从红果到白鱼、从鸛鹑到凤凰、从鼓鞞到鸛策、从三皇到五帝、从银章到省郎、从胡骑到羌兵、从租庸到征求……，甚至“鹅鸭宜长数，柴荆莫浪开”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就是杜甫！否则就不足以言“无施不可”、“包络一切”杜诗以雄鸛奥博为主，而不乏飘逸轻盈、亲切家常，具有雅俗并具的多样性风格，用以构筑诗歌的美学殿堂，使人不但不觉其繁琐，而且缺了一扇“柴荆”就会减色，就不成其为杜诗，就没有老杜的全部之美。杜诗的“无施不可”是以个人的进退出处、浪游生涯为题材，为出发点的。当然，“无施不可”还是以“有所不施”为补充的：“无施不可”的是以关注世事的“我”为中心的神思所至、观察所及；“有所不施”的是背离“我”的追求的“轻薄为文”、“

点”“伪体”等等。甚至古诗中常用的“托体代言”，杜诗也较少使用，而宁肯追踪足迹，不加穿凿，真率无邪甚至赤裸裸地坦言自我。在美学上既以雄鸷奥博也以凡俗为美，在人格上又以为生民立命和以自身的凡人本色为尚，自然会产生大至关注国家的青琐昭阳（宫殿名）、小到打理草堂的一草一木的，与自传体若即若离的格调。

（二）关于“ 悯时伤乱 ”和“ 一生言愁 ”：

正是因为杜甫以我为诗，袒露自己的灵魂，竟被一些古人所诟病。如杜诗被指责为“ 叹贫嗟老，其志陋矣 ”^[6]或“ 愁贫怯死 ”^[7]。

当然，大多数评论者是公正的，如清人叶燮看到：“ 如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与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杯酒，抒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 ”^[8]朱熹和王夫之也谈到过杜诗的上佳之处。

杜甫写于沦陷的长安的《对雪》，这首短诗曾两言“ 愁 ”：“ 愁吟独老翁 ”、“ 愁坐正书空 ”。而诗人写这些 都是联系着国家命运的。《对雨》：“ 不愁巴道路（个人入蜀的道路）恐湿汉旌旗。 ”说明诗人常常甚至不是为个人而愁。《愁坐》：“ 高斋常见野，愁坐更临门。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月昏。葭萌氏种迥，左担犬戎存。终日忧奔走，归期未敢论。 ”——个人的“ 愁坐 ”是因诗人对于“ 葭萌氏种迥，左担犬戎存 ”的严酷形势的忧心忡忡所决定的。

翁方纲说，“ 杜虽生于兵燹播迁之际，似竟一生言愁者，然此其面目耳，非其神髓也。 ”^[9]《杜臆》也正面谈到杜诗的言愁。——其实，不必讳言杜甫的“ 一生言愁 ”。想要避开杜的“ 一生言愁 ”，是避不开的，甚至会遇到“ 愁贫怯死 ”那样的指责。

杜诗是从来不讳言个人、众人的“ 贫 ”和“ 死 ”的。妙就妙

在，他神奇地将评判者视为丑陋和不敢触及的“贫”和“死”，化为具有历史感和神圣意味的美学品格。贫而有骨气，虽不讳言贫而安贫乐道。也可以说，杜诗凡遇可涉及贫穷的题材都是不放过写贫穷的。如《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甚至大写诗人自己的贫穷，住在“柴荆”（柴门，指草屋）、吃着“藜羹”（藜草作的羹）、穿着“短褐”、铺的是“粗席”。但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这样的诗人决不肯接受华贵的“织成褥段”：“锦鲸卷还客，始觉心和平。”——这是作为诗歌的美感的舒卷自如的杜诗，也是作为凡人的自白的安贫乐道的杜甫！龚自珍在《书汤海秋诗集后》中说：“人以诗名，诗尤以人名。人外无诗，诗外无人。”这对于杜诗的“以我为诗”尤其适用。

再如《八哀诗》这八首长诗，不但以人物传记入诗，而且描写“死亡”（吟咏大唐朝野一些志士仁人的壮丽或惨烈的死）也极有特色。如《杜臆》于《八哀诗》之《李公邕》所说：“此老才名甚盛而死极惨，公痛之甚”，杜甫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施之藻翰的。也可以说《八哀诗》是对大唐政坛、文坛的精英之撒手人间的不同命运的深刻反思，是对大唐的国事日非的命运的某种预言。

杜诗的一定的自传体风格，满足了“自传事实的内涵应该包括”的“两个方面”：“展示自我生成的事实和经验化的事实”^[10]。粗浅地说，试看杜诗句句离不开自我（如“卷我屋上三重茅”）而又成为千古名句（如“安得广厦千万间”）正是上升为普遍的理性经验的结果。

二、“以我为诗”与“推理之明，料事之确”

永远存储在艺术宝库和人们记忆中的一千四百多首杜诗，使世代的中华儿女倾倒、折服。人们为之振奋，为之哭泣，为之手舞足蹈。或誉之为“情圣”（梁启超），或誉之为中华第一诗人（闻一多、陈寅恪）。当然，所谓“第一诗人”是赞美之词；李